

玉阶良史笔,金马掞天才

——论上官仪的诗歌理论及其贡献

李晓青

(天津理工大学 法政学院, 天津 300191)

摘要:唐初诗人上官仪的创作实绩使他成为唐诗律化的先驱,他的诗歌理论专著《笔札华梁》也沾溉后世。根据现有文献可知,上官仪《笔札华梁》约当唐元和(806)之前流传到日本,并为弘法大师空海所引用。《笔札华梁》内容有“八阶”、“六志”、“属对”、“七种言句例”、“文病”、“第四病”、“论对属”等,上承齐、梁以来探求音律的遗风,下开元兢、崔融等人的理论,在诗歌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上官仪;诗歌理论;笔札华梁;沾溉

中图分类号: I2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08)02-0070-04

上官仪生前文名,著于贞观之世而尤显于高宗之朝。有关上官仪的诗歌创作及“上官体”的问题前贤已有所论,笔者在此不欲多言,本文想就上官仪的诗歌理论及其影响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上官仪著有专论诗律技巧的专著《笔札华梁》,但久已失传,关于《笔札华梁》存有问题一事,王梦鸥、张伯伟等学者已有论述,在此综述如下:

由《新唐书》及《宋史·艺文志》可知,其文史类虽列有若干种诗格诗评之书,究以出于晚唐五代者为多;至于唐初之著述,仅列有李嗣真《诗品》,元兢、宋约《诗格》等目,“新书”成于宋人之手,而《宋史·艺文志》之编成时代抑又在后。元兢诗论(《诗格》)之原名应为《诗髓脑》。

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以为:《日本国见在书目》“小学家”类著录《笔札华梁》二卷,未题撰人。《宋秘书省四库阙书目》“文史类”著录有上官仪《笔九花梁》二卷,“九”当为“札”之误。此书目编于南宋绍兴年间,在《笔札华梁》下已注明“阙”,可知此书在中土亡佚已久。北宋仁宗宝元三年(此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王应麟《玉海》作宝元二年),李淑撰《诗苑类格》三卷,其中引述了上官仪的“六对”、“八对”说,实即出于《笔札华梁》,《文镜秘府论》亦引用此书若干节,从某些版本所残存的“《笔札》云”等字眼中,可知空海乃直接引录《笔札华梁》的原文。

今据魏庆之《诗人玉屑》卷7,尝转录李淑《诗苑类格》,其中引述上官仪论律诗对偶格式,与现存《文镜秘府论》引上官仪笔札所言者全同,可知上官仪原有此类著述。《诗人玉屑》成书于南宋理宗之世,而所据之《诗苑类格》则成书于北宋仁宗时代。晁公武《读

书志》卷20叙李淑《诗苑类格》云:“宝元三年(王应麟《玉海》卷54录此书作宝元二年),李淑为王子傅,纂成此书上之。述古贤作诗体格,总九十目。”宝元二年(1039)较《新唐书·艺文志》之编成犹早出二十余年(据新书进书表载嘉祐五年计算),不载上官著作,御府所阙而已。王梦鸥《初唐诗学著述考》对此论之甚详。

结论:上官著作约当唐元和(806)之前流传到日本,并为弘法大师空海所引用。只是关于《笔札华梁》的文献不足,难以尽知,然可推断编成时代当不晚于唐高宗之世,《诗髓脑》作者元兢是见过《笔札华梁》的。

现在能看到的《笔札华梁》是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据日人遍照金刚(弘法大师空海)《文镜秘府论》所辑录该书零散片段合于一处。

《笔札华梁》内容有“八阶”、“六志”、“属对”、“七种言句例”、“文病”、“第四病”、“论对属”等,上承齐、梁以来探求音律的遗风,又下开元兢、崔融等人的理论。本文下面要着重谈谈上官仪在“对属”和“声律”方面的重要贡献。

在《笔札华梁·论对属》中,上官仪认为,对属是文章的题中应有之意,“凡为文章,皆须对属。诚以事不孤立,必有匹配而成。”“在于文章,皆须对属。其不对者,止得一处二处有之。若以不对为常,则非复文章(若常不对,则与俗之言无异)”“故援笔措辞,必先知对,比物各从其类,拟人必于其伦。此之不明,未可以论文矣。”这里的“文章”指的是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对属总的来说不出两大类,一类是事义相反的对,如“上”与“下”,“尊”与“卑”,“有”与“无”等;

收稿日期: 2007-10-30

作者简介: 李晓青(1965—),蒙古族,文学博士。E-mail: lixqq@163.com

另一类是以类相对的类对,如“一二三四”数之类,“东西南北”方之类,“青赤玄黄”色之类等。此外,还有“偶语重言,双声叠韵”等依据语言形式而相对者。

接着,上官仪指出了对属常见的四种情况:“在于文笔,变化无恒。或上下相承,据文便合。”“或前后悬绝,隔句始应”“或反义并陈,异体而属”“或同类连用,别事方成”,“上下相承,据文便合”指同位同类相对,“前后悬绝,隔句始应”指隔句相对,“反义并陈,异体而属”指反义、异体相对,“同类连用,别事方成”指上句同类连对与下句同类连对相对。除此之外,还有像“上升下降”、“前复后单”这样的比较灵活的对属。所以他又说:“文无定势,体有变通,若又专对不移,便复大成拘执。”就是说,对属要遵循基本原则“比事属辞,不可违异”,在此基础上,灵活运用,“可于义之际会,时时散之”。另外,他又指出,对属句子都是并见事类以成辞,不对属句子都是下句接上句相因以成义。

关于对属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上官仪认为,对属要注意一“远近比次”,即讲究时间上的对应性,二“大小必均”,即讲究空间上的对应性,三“美丑当分”、“强弱须异”,即讲究美丑、力量上的对应性。从而,“比物各从其类,拟人必于其伦”,“异名”而“同体”不可以对属。

这里的“文章”指的是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虽说不是专对诗歌而言,但却是以诗歌为主要对象,因此,无疑将给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及其规范化和定型化,在理论上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影响到唐诗创作和理论研究。

以上是上官仪关于对属的种类、方法、应该注意的问题等的论述。对仗是指诗中的对偶,是从古代仪仗中引过来的。对仗是诗歌形式美的重要因素,《尚书》中已经出现,如“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满招损,谦受益”,《易经》中的“云从龙,风从虎”,《诗经》中的“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等等。对于这种文学现象刘勰给以总结:“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文心雕龙·丽辞》)自然形体具有和谐美,中国传统思维二元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平衡心理的产物,它植根于下意识中,与生俱来,朦胧原始而不自觉。

关于对仗的种类刘勰分为四种:“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文心雕龙·丽辞》)

上官仪将对仗分为六种、八种,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引《诗苑类格》说:“唐上官仪曰:诗有六对:

一曰正名对,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类对,花叶草芽是也;三曰连珠对,萧萧赫赫是也;四曰双声对,黄槐绿柳是也;五曰叠韵对,彷徨放旷是也;六曰双拟对,春树秋池是也。又曰:诗有八对:一曰的名对,‘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是也;二曰异类对,‘风织池中水,虫穿叶上文’是也;三曰双声对,‘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是也;四曰叠韵对,‘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是也;五曰连绵对,‘残河河若带,初月月如梅’是也;六曰双拟对,‘议月眉欺月,论花颊胜花’是也;七曰回文对,‘情亲因意得,意得逐情亲’是也;八曰隔句对,‘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不归’是也。”

上官仪这种对声律问题的研究,在隋末唐初是很有代表性的。佚名的《文笔式》、元兢的《诗髓脑》等都是这一时期探讨声律问题的重要著作,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认为《文笔式》的产生时代当在稍后于《笔札华梁》的武后时期。这些著作研究属对问题,提出具体属对方法,并详细划分属对类别。《文笔式》有十三种对之说,《诗髓脑》有八种对之说,总的倾向是日益趋向于灵活、宽泛,佚名的《文笔式》划分的十三种对与上官仪相同的名称有:的名对、隔句对、双拟对、联绵对、异类对、双声对、叠韵对、回文对,其他名称不同的如互成对即为上官仪所说四种对属方法中的“同类连用,别事方成”,赋体对指句首、句腹、句尾重字、叠韵、双声等的情况,意对、头尾不对、总不对对几种,已经完全打破了传统格套,更加自由灵活。元兢《诗髓脑》所分八对是:正对、异对、平对、奇对、同对、字对、声对、侧对,这种分法和上官仪的角度不同,更细致、更进一步了,引例也较复杂,奇对、侧对之类,其文巧程度,全非上官仪始料所及。“作者奋其巧思于文字雕饰之途,笔墨游戏,遂亦愈见繁难。”^[1]现将《诗髓脑·对属》抄录如下:

一、正对。正对者,若“尧年”、“舜日”,“尧”、“舜”皆古之圣君,名相敌,此为正对。若上句用圣君,下句用贤臣;上句用“风”,下句还用“鸾”,皆为正对也。如上句用“松桂”,下句用“蓬蒿”,“松桂”是善木,“蓬蒿”是恶草,此非正对也。

二、异对。异对者,若“来禽”、“去兽”,“残月”、“初霞”。此“来”与“去”、“初”与“残”其类不同,各为异对。异对胜于同对。

三、平对。平对者,若“青山”、“绿水”,此平常之对,故曰平对也。他皆放此。

四、奇对。奇对者,若“马颊河”、“熊耳山”,此“马”、“熊”是兽名,“颊”、“耳”是形名,既非平常,是为奇对。他皆仿此。又如“漆沮”、“四塞”,“漆”、“四”是数名,又两字各是双声对。又如古人名,上句用“曾

参”,下句用“陈轸”,“参”与“轸”者,同是二十八宿名。若此者,出奇而取对,故谓之奇对。他皆仿此。

五、同对。同对者,若“大谷”、“广陵”,“薄云”、“轻雾”。此“大”与“广”、“薄”与“轻”,其类是同,故谓之同对。同类对者,云、雾、星、月、花、叶、风、烟、霜、雪、酒、觞、东、西、南、北、青、黄、赤、白、丹、素、朱、紫、宵、夜、朝、旦、山、岳、江、河、台、殿、宫、堂、车、马、途、路。

六、字对。字对者,若“桂楫”、“荷戈”,“荷”是负之义,以其字草名,故与“桂”为对。不用义对,但取字为对也。

七、声对。声对者,若“晓路”、“秋霜”,“路”是道路,与“霜”非对,以其与“露”同声故。

八、侧对。侧对者,若“冯翊”(地名,在左辅也)、“龙首”(山名,在西京也)。此为“冯”字半边有“马”,与“龙”为对;“翊”字半边有“羽”,与“首”为对。此为侧对。又如“泉流”、“赤峰”,“泉”字上边有“白”,与“赤”为对。凡一字侧耳,即是侧对,不必两字皆须侧也。以前八种切对,时人把笔缀文者多矣,而莫能识其径路。于公义藏之篋笥,不可垂示于非才。深秘之,深秘之。

元兢,其人不见于唐史,唯《新唐书·艺文志》于其诗格之外,又著录其《古今诗人秀句》二卷。王梦鸥认为此一《古今诗人秀句》二卷,与同一文史类中别出的《元思敬诗人秀句》二卷是别名,“元思敬”亦即“元兢”的别名,生存年代与上官仪相当。

对声律问题的研究,除了对偶规律的探索外,上官仪还有其他一些极重要的贡献。比如四声的二元化,即将平、上、去、入简化为两大类,这一点在元兢《诗髓脑》中体现最为集中。这类研究无疑给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和规范化、定型化,在理论上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四声的二元化、粘对规则等后来已经成为唐代近体诗所必须依循的准则。这种影响随着唐诗创作的发展,以及其后理论著作如旧题王昌龄撰《诗格》等的继承性研究,而显得日趋明显。

元兢将平声与上、去、入三声相对举来谈声律问题,可以说,他的声律理论就是建立在四声二元化的基础上的,他的对粘对规则的探讨,有讲“换头”一法,元兢《于蓬州野望》诗曰:“飘摇荡渠域,旷望蜀门隈。水共三巴远,山随八阵开。桥形疑汉接,石势似烟回。欲下他乡泪,猿声几处催。”就着重谈到了对的规则,即平声必须与上、去、入声相对,同时还提出诗歌中的第二三句、四五句、六七句头两字的声调要分别相同的原则,即为近体诗之粘的规则。此外,他们也对病犯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比齐梁以来的“八病

说”更为宽松的看法。

上官仪酷裁八病,元兢《诗髓脑》既重复了上官仪八病,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八病,即于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傍纽之外,又增加了齟齬病、丛聚病、忌讳病、行迹病、傍突病、翻语病、长擗腰病、长解铎病等八种。对于前八种病的论说,较旧例说法,有的较宽简,有的则更严格。下面将对于前八种病的论说进行分条列举,可以一目了然:

一、平头。

旧例:五言诗第一字不得与第六字同声,第二字不得与第七字同声。同声者不得同平上去入四声,犯者名为平头。

元兢:上句第一字与下句同平声,不为病;同上去入声,一字即病。若上句第二字与下句第二字同声,无问平上去入,皆是巨病。

二、上尾。

旧例:五言诗中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

元兢:此为巨病。若犯者,文人以为未涉文途者也。

三、蜂腰。

旧例:五言诗一句中,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

元兢: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去上入,皆是病,平声非病也。此病轻于上尾鹤膝,均于平头,重于四病。

四、鹤膝(缺)

五、大韵。

旧例:五言诗若以新为韵,上九字中不得安人津临身陈等字。既同其类,名为犯大韵。

元兢:此病不足累文,如能避者弥佳。若立字要切,于文调畅不可移者,不须避之。

六、小韵。

旧例:除韵以外而有叠相犯者,名为犯小韵。

元兢:此病轻于大韵,近代咸不以为累文。

七、傍纽。

元兢:傍纽者一韵之内,有隔字双声也。此病轻于小韵,文人无以为意者。若不隔字而是双声,非病也。

八、正纽。

元兢:正纽者一韵之内,有一字四声分为两处也。此病轻重,与傍纽相类,近代咸不以为累,但知而已。

以上八病自沈约以来,递相衍述,到了元兢这里,又加以说明,不是元氏创见。然齟齬等八病则是其创见。这八病中,除了齟齬病之外,讲的都是语义之病。如丛聚病是说诗句上下云霞风月俱有是为病,忌讳病是说意义有涉于国家之忌是为病,行迹病是

说其义相形嫌疑是为病,傍突病是说句中意者傍有所突触是为病,翻语病是说正言是佳词,反语则不祥是为病,长擷腰病是说每句第三字擷上下两字,几句相连是为病,长解铎病是说第一第二字意相连,第三第四字意相连,第五单一字成其意,几句相连是为病。

元兢《诗髓脑》与上官仪《笔札华梁》相因而作,《诗髓脑》云:“兢于八病之(外)别为八病,自昔及今,无能尽知之者,近上官仪识其三,河间公义府思其余事矣。”则显然是对上官仪的补充。又如“齟齬病”下指出:“此例文人以为秘密,莫肯传授。上官仪云:‘犯上声是斩刑,去、入亦绞刑。’”即为明证。新增八病,本不全属于诗句中文字声律之安排,而是指向了诗语涵义,所以,前八种“声病”为主,新增八种为“语病”为主。所以,上官仪列八病原则,元兢调声三术,实为八病之补充。日僧空海《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声》《七言尖头律》、南卷《定位》、西卷《文二十八种病》俱引元兢说,东卷《二十九种对》云:“右六种对,出元兢《髓脑》。”

上官仪的理论与创作在律诗形成中有重要的地位。《笔札华梁》提出的问题在《文笔式》和《诗髓脑》中有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崔融《唐朝新定诗格》更进一步了。

《唐书》《崔融传》云:“崔融字安成,齐州全节人。初应八科举擢第,累补宫门丞兼直崇文馆学士。……融为文典丽,当时罕有其匹,朝廷所颁《洛出宝图颂》、《则天哀册文》及诸大手笔,并手敕付融。撰《哀册文》,用志精苦,遂发病卒,时年五十四。以侍读之恩,追赠魏州刺史,谥曰文。有集六十卷。”日僧空海《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四声谱》、地卷《十体》、东卷《二十九种对》、西卷《文二十八种病》,俱引崔融说。《二十九种对》云:“二十六曰切侧对,二十七曰双声侧对,二十八曰叠韵侧对。右三种,出崔氏《唐朝新定诗格》。”崔融年辈稍后于元兢(王梦鸥《初唐诗学著述考》页81第三章有“崔融生平及其

诗学”一节,论之甚详)。《新定诗体》曰诗有九对:一曰切对,二曰切侧对,三曰字对,四曰字侧对,五曰声对,六曰双声对,七曰双声侧对,八曰叠韵对,九曰叠韵侧对。可知,元兢于上官仪对属基础上已增侧对一种,崔融又从侧对增加三例,有切侧对,双声侧对,叠韵侧对。除了九对十体之外,崔融亦言及声病,且其所言,又出于上官仪元兢所已言者之外,可谓是增充之诗病六种。这六种诗病例是:一曰相类,二曰不调,三曰丛木,四曰行迹,五曰相滥,六曰反语。其中见于日僧空海《文镜秘府论》者,都是崔融的零星语句,原文或为空海所改编,其中或详或略,并不足以代表原著,但毕竟从中可知崔融原书确曾论及诗病。

“玉阶良史笔,金马掞天才”,(杨师道《中书寓直咏雨简褚起居上官学士》)要之,上官仪对于唐诗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诗歌语言形式的追求上,创作实绩使他成为唐诗律化的先驱。上官仪等的努力已指向了外形精美的盛唐律诗。《新唐书·宋之问传》云:“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对此,上官仪与有力焉。”赵昌平说:“上官仪上承虞世南、李百药、杨师道而卓然名家,又下开四友、沈宋一脉,即使反对上官体的四杰,究其创作实际,实也受到上官体的深刻影响。至盛唐,上官体虽已过时,但其艺术因素依然对唐诗发展起着重要影响,可以说盛唐诗既是上官体的反拨,又有着对它不可或缺的继承,没有上官体的成就及其后继者的开拓,盛唐诗恐怕至多只是对汉魏诗的简单回归而已。”^[2]日僧空海《文镜秘府论》认为自上官仪至崔融相当于唐太宗至睿宗时代,是为建立唐朝新体律诗之重要阶段,今所见“采丽竞繁”之诗学内容,就是唐朝新体律诗的发轫。殷璠《河岳英灵集》序说:“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

参考文献

- [1] 王梦鸥. 初唐诗学著述考[M]. 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73
- [2] 赵昌平. 文学史[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17.
- [3] 魏庆之. 诗人玉屑[M]. 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 [4] 阮阅,周本淳. 诗话总龟[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 [5] 刘克庄. 后村诗话[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6] 张伯伟. 全唐五代诗格校考[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 [7]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 郡斋读书志校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下转第78页)

The Family Formation, the Group Portrait and the Filiation Code

DENG Peng¹, CHEN Lei²

(1.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3; 2.School of Chinese Cul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John Galsworthy's and Zhang Wei's Sartoris constitute respectively two literary world with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which reflect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eastern and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 homogeneity of household culture. Ancestry and reality are the rich sources of both charming sartoris literature. In the two sartoris, there are abundant and profound personal experiences which are presented in the external similarities and internal differences of family formation, complex virile code in family filiations, group portrait building principle and intellectual's aesthetic broaden horizon. In view of these factors, there must be new significance in the insigh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by analyzing the structure of sartoris widely and deeply and discussing literature expressive force of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y in different ages.

Key words: john galsworthy; ZHANG Wei; family formation; virile code; group portrait building principle; aesthetic horizon broadening

[责任编辑: 箫姚]

.....
(上接第 73 页)

Shangguan Yi's Poetic Theory and Her Contribution to Poetry

LI Xiao-qing

(School of Legal Science and Politics,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191)

Abstract: Shang Guan Yi's contribution to the composition of lushi makes him the pioneer poet in Tang Dynasty. His theoretical monograph of poetry Bi Zha Hua Liang remarkably benefits people in the later ages.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documents, Bi Zha Hua Liang once had been spread to Japan around 806A.D. and it also been quoted by Kong Hai. Bi Zha Hua Liang includes "ba jie", "liu zhi", "shu dui", "qi zhong yan ju li", "wen bing", "di si bing", "lun dui shu" etc. It not only inherits customs handed down from the past, but also initiates Yuan KE's and Cui Rong's theory in the follow generation. This theoretical monograph makes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poetic theory.

Key words: SHANG Guan-yi; poetic theory; bi zha hua liang; benefit

[责任编辑: 箫姚]